

涵养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

王一川

摘要：2020年全球重大疫情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并非一国一家之事，而是全球之事，并牵扯起一连串多元文化问题，乃至尖锐激烈的争论。在这个过程中跨越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简单化论争，坚持以中国本文化为主位，冷峻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正文化与异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及民间文化等之间的诸多关系，提出独立思考的意见，正是在这种巨变时刻涵养多元文化型学人的一次教科书般的生动实验，这项工作指向未来的中国学人培育体系改革中也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多元文化型 大育人理念 从游式传统 建设跨文化学

2020年春季以来一场百年未有之全球大疫情，与人们近来时常谈及的百年未有之全球大变局交接在一起，形成了异常的巨变时刻，令人的危机感成倍叠加。身处如此新一轮巨变时刻的中国学者，应当怎样生活才有意义？作为身处如此巨变时刻的中国高校教师，应当培育什么样的中国学人才算真正履行自己的使命？想必人们都在思考。广大年轻学子在特殊疫情期间如何认识和思考世界、人生和学问？这次也是一次严峻考验。近期出版的《非常跨文化对话》正是为数不多的回答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①。

首先，吸引我的是危机时刻的大育人理念。这次大疫情或大瘟疫，一场全球大灾难，赶上百年未有之巨变，堪称学术界常说的“危

^① 董晓萍等：《非常跨文化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机时刻”。大凡人类历史之“危机时刻”往往特别能激发仁人志士的异常的和伟大的创造力，育人也应如此：在危机时刻培育具有未来伟大创造力的伟大人物。这让我难免想到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在19世纪初所作的14次演讲汇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里面有着一整套富于远见卓识、令人荡气回肠的德意志民族危机时刻的“新教育”变革构想。为了化解德意志民族遭遇的危机，他提出“解救之道就在于培养一种全新的自我，这种自我至今也许作为例外在个别人中存在过，但从来没有作为普遍的、民族的自我存在过；就在于教育那个业已丧失往日生活的光辉，而变成一种外来生活的陪衬的民族，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而为了培育德意志民族的“全新的自我”，他把教育视为“维护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唯一手段”，主张“完全改变迄今的教育制度”。^①他随之提出的“新教育”及民族主义公民教育观等理念，在德国和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认定“在大学学习是一种天职”，而“大学及其全部设置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保障这种天职的履行”。^②作者董晓萍教授显然就应当是在实施自己选定的大疫大育人理念，以此为年轻人在非常态时期继续履行其“天职”提供异常珍贵的帮助和指导。这一点可从作者为该书写的《导言》中读到：“研究生在到达高级人才阶段之后，每人都可能成为成功者，因此每人都需要伟人做榜样。……高等教育不能没有伟人教育，伟人是地球文化孕育的最高精华。疫情总会过去，伟人指引前方。”要在这场大疫中实施“伟人教育”，以“伟人”的高规格模式去涵养走向未来的跨文化型中国学人，真是理念高远，师心可嘉！

其次，是跨文化育人方法。这场大疫情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并非一

① [德]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2—263页。

② [德]费希特：《关于对学府自由唯一可能的干扰》，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5卷，第520页。

国一家之事，而是全球之事，牵扯起一连串的跨文化问题，乃至尖锐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既有国与国之间的，更有国内群与群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甚至搅动起多年来未有的意识形态大撕裂，只不过现在是网络化的。作者跨越非此即彼、不白即黑的简单化论争，坚持以中国本文化为主位，冷峻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正文化与异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等之间的诸多关系，提出他们有关大疫情下人生、学术、中外关系等问题的独立思考。这等于是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上同时履行她自己提出的跨文化构想。此书可谓一次生动而深刻的跨文化学科探索之旅。

再有就是“从游”式育人传统的当代实践。这本书的独特特色之一在于，紧紧跟随疫情进展而每日以手机微信对谈的方式展开，属于疫情情境下的师生问答，体现出孔子“从游”式育人传统的当代转化形态。当然，与孔子带领弟子们在周游列国旅途中根据不同情境下的问答而展开育人不同，这次是跟踪疫情持续情境中生发的新问题而在手机微信中展开对谈，是在物理隔离状态下的纯粹精神漫游、心灵对话，在网络时空中引领学子们思考与疫情情境相关的人生与学术问题，堪称古老的“从游”育人传统在互联网时代的光大形态。

最后，如上这样做的育人目标在哪里？我想到了有关“单文化人”、“双文化人”、“多元文化人”等不同说法。从书稿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作者从单一文化人到多元文化型中国人培育的自觉筹划和实践。跨文化交际学科开拓者之一的迈克尔·H.普罗瑟（Michael H. Prosser）曾在其《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中论及“多元文化人”（multicultural person）问题。他把“多元文化人”视为一种“能相当轻松地在多种文化里出入的人”，他们“常常处在一种旧文化和新文化的边界上”，并且“能在相当实质性的意义上出入不同的文化，而不是在肤浅层次上出入了”。不过他同时又担忧这种新型人不得不时常遭遇一种烦恼：“多种价值观在他们身上的张力常常是如影

随形。”^①作者一方面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多元文化人”式人才结构的涵养，以便让学子们能够顺应当前世界的多元文化间对立而又对话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又力求跨越这种来自多种价值观的张力的缠绕，形塑中国主体性或中国意识，凸显巨变时刻中国价值自觉，从而自觉地培育一种具备多元文化型素养而又富于中国意识的学人，不妨简称为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这种学人拥有基于跨文化眼光的多元文化素养，更有坚定的中国主体意识，善于从中国主体立场开放地容纳和批判地吸收世界多元文化资源，旨在形成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中国品格。如果这种理解有一定合理性，那么，我生出了这样一种想法：这部书本身就是巨变时刻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涵养上的一次教科书般的生动实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多元文化型中国学人培育实验，在指向未来的中国学人培育体系改革中应具有一种示范性意义。

我相信并期待，《非常跨文化对话》的出版，不仅经历本次疫情的高校研究生的未来成长，而且对更多年轻学人的未来成长，还有，特别是对包括我在内的高校教师的育人实践，都会产生有力的启迪和“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般的感召作用。

^① [美]迈克尔·H. 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